

果戈理与沈从文笔下的乡村和城市

曾 煜^①

(湖南省卫生厅 国际合作处, 长沙 410008)

摘 要:俄国作家果戈理和我国现代作家沈从文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构筑了两个相对立的文学空间:乡村与城市。一方面,乡村图景寄托了他们美好的记忆,也是他们对现实城市生活的反拨,只不过果戈理笔下的乡村世界具有浓郁的喜剧色彩,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悲剧色彩较浓;另一方面,作为城市生活的观察者和描绘者,他们同样用讽刺的、嘲弄的文字展现了一幅幅卑微的、非人性的城市生活图景。

关键词:果戈理;沈从文;乡村;城市

自从人类从蒙昧时代走出,并日益向文明时代迈进之后,城市与乡村便构成了人类生存空间的主体,人类的艺术活动便滋生于这两个空间。城市与乡村这两个空间对于艺术的影响是总体上的、全方位的。城市与乡村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空间,是两个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在价值观念上都迥然相异的世界。城市滋生于乡村之上,是广袤无垠的乡村大地的儿子。当城市从乡村的母体中孕育而出并日益脱离乡村母体之后,它便沿着自己的轨道,一刻不停地朝着它自己才知道的目的地进发,在飞速发展中一步步地改变着这个世界的面貌。因而城市与乡村构成了文学艺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

—

在同一视域下观照俄国作家果戈理与我国现代作家沈从文,我们会发现两者都构筑了相对立的文学空间:乡村与城市。果戈理创作了《狄康卡近郊夜话》与《彼得堡故事集及其他》,从标题可以很明显看出,作品中所构筑的世界是狄康卡乡村和彼得堡城市。《狄康卡近郊夜话》生动地讲述了一系列乌克兰乡村的民间传说,《彼得堡故事集》以锋利的笔触揭露了俄国沙皇的黑暗统治以及低等官员的亚健康的生活状态。这两个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狄康卡乡村尽管贫穷但充满了欢声笑语,神秘而充满诗意。彼得堡虽是现代文明的都市,高楼林立,街道

繁华,但因缺少人性的关怀而充满了腐朽与堕落、失望与绝望。生活其中的低等文官虽有让人羡慕的固定收入和体面的办公桌,但他们是孤独而卑微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只能有黑夜作伴,白天虽与人同处一室但相望无语,整个的生活压抑而沉闷。狄康卡乡村所拥有的欢声笑语在这里找不到一丝影儿。沈从文的创作也可以明显分为两个对立的文学世界:湘西与北京、上海等城市。前者以《神巫之爱》《月下小景》《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萧萧》《丈夫》《边城》等为代表,充分地展现了一幅完整的湘西生活画卷:笑与泪、悲与喜、爱与恨,一切都是那么真切而朴实。后者以《绅士的太太》《八俊图》等为代表,展现了一幅城市人的生活图景:病态、畸形而压抑。

乡村作为城市的异己存在,是作家对现存的生活状态不满之下的一种文学想象。身在城市,心系乡村。果戈理与沈从文所构筑的乡村与城市的世界在精神内涵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难道这仅仅就是一次文学上的巧合吗?其实不然。从作家儿时的记忆和早期的经历出发我们可以探寻些许缘由。

果戈理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对首都彼得堡非常向往。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往往在上课时我的思想飞往彼得堡……同你一起欣赏涅瓦大街、大海,这是我一大快事。”^{[1]13}所以中学毕业后果戈理迫不及待地和朋友踏上了赴京之路。那个年龄的他完全不谙世事,没有预计城市生活所要面临的不便与困难:

① 收稿日期:2008-05-26

作者简介:曾煜,女,湖南常德人,湖南省卫生厅国际合作处翻译,主要从事俄、英文翻译和俄国文学研究。

住房要房租,吃饭要饭钱,维持必要的体面也需要不少的花费。这一切很快让果戈理濒临“破产”,使之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向家里“求助”：“每月房租我们要付八十卢布……食品也不便宜，……这一切都迫使我只能过沙漠般的日子。”^{[1] 38}“我还是不得不向您，我的慈祥的，宽宏大量的妈妈，请求救济。……我现在需要三百卢布的钱。”^{[1] 47}此外他很想接触当时社会上的文学名人，但因自己只是一个无名之辈而被拒绝。在京城谋生之路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受挫让果戈理对曾经那么向往那么憧憬的城市感到非常失望。但没有绝望，因为在不断的尝试中他最终找到了一种安慰自己孤独灵魂的方式——把家乡的民情风俗与民间故事传说用文字表现出来，营构了一个心灵的避风港——狄康卡近郊。幸运的是，这个文学的“乡村”世界很快博得了城市人的好评与喝彩，也给果戈理的城市生活带来了转机与希望，为他继续在城市生活下去提供了经济保障。童年的记忆成为果戈理创作的起点和开始，尽管他以后很少回到现实的狄康卡中去。

沈从文小时候没怎么接受正规的教育，几乎是在与池塘、田埂和石头作伴中长大，稍大以后又当了兵，随着部队到处漂流。再后来就赤手空拳带了一脑子不切实际幻想进了北京城，开始了他的城市生活。城市对于初来者向来是不友好的。北京一开始不接纳他，像他这样衣衫褴褛、不修边幅的举止令北京的绅士们侧目而视。他当年到报社去领4块到7块的稿费的时候，要先给门房7毛钱、3毛钱才让他进去，因为他衣衫太褴褛，他是一个不被北京接受的乡下人。沈从文体验了类似于果戈理的城市心理历程，别人讥笑他是乡巴佬，语法都弄不清还想写作，简直是异想天开。被排斥与无助的经历让沈从文虽居城市而心系湘西那座古老的“希腊小庙”：“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山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2]因为在那里没有人会嘲笑一个不懂语法的年青人的文学梦想，也没有人会向一颗单纯的心投去鄙视的目光。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系列是沈从文对儿时记忆的一种文学想象，更是一个城市漂泊者对现状的反拨，只有在这种想象的世界中作家才能得到城市所不能给予的心灵归宿和心理慰藉。

记忆虽已逝去，但在作家心中却是那么清晰甚至可触摸。在异乡回望儿时的乐园，虽远犹近，因为与当下的生活相比，它是那么鲜活，那么富有生机。城市中绝大部分人都有着类似的人生体验，因而这

类作品很容易引起众人的共鸣，这也是他们的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果戈理和沈从文身上还有一种共同的东西：顽强的边缘意识。果戈理所属的乌克兰民族和沈从文所属的苗族都是中央统治下的少数民族，处于边缘地带。当他们来到城市的时候，内心的敏感与自卑让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狄康卡和湘西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人生早期经历的总结，更是作为边缘人与城市人对抗时的一种方式。他们最终以精神的“边缘化”获得物质上的“中心化”——在城市中立足。

—

因为相似的城市际遇和民族身份，果戈理和沈从文在同一视域下构筑了相互对立的乡村与城市世界，但细细读来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差异。果戈理笔下的乡村世界具有浓郁的喜剧色彩，喜中露笑。《狄康卡近郊夜话》是一组歌颂青春与英雄、充满诗意与趣味的故事，充满着毫不做作的欢快情调，自然纯朴的真诚情感，朴实而狡黠的幽默。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欺骗与虚伪，只有纯朴与善良。它释放了城市人内心的压抑，带来的是轻松的笑声和心灵的真正宣泄。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悲剧色彩较浓，悲中透美，透出人性的悲壮美。如果说狄康卡对于果戈理来说只是儿时的回忆和民间传说的汇集地，那么湘西对于沈从文来说，意义远不只如此。沈从文在《从文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可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3]所以湘西在沈从文的心中是神圣的，是他心灵深处的朝拜圣地。但在创作中我们看到的决不是盲目的狂热的崇拜，而是清醒状态下的反思：他看到了湘西的偏僻落后和蒙昧无知，以及这些所造成的人性悲剧。为此他是痛苦的，痛惜的。但悲悯中仍透着对人性的希望，希望他心中的“乡下人”能从蒙昧中走出来，改变现状，避免悲剧的继续。

不同的创作动机和心理影响了作家对同一主题的处理。《狄康卡近郊夜话》和湘西小说系列大部分是以乡村爱情为主题，但果戈理和沈从文却作了不同的处理。《狄康卡近郊夜话》中表现的爱情是轻松活泼的，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所罗奇集市》中

的哥萨克青年勇敢地冲破凶狠继母的阻挠,与心爱的人终成眷属。他是勇敢的、机智的和风趣的。《五月之夜》中在美妙的五月之夜,热恋中的列弗柯在爱好自由的好朋友的帮助之下,骗过有权势而愚蠢的村长,终于得到了富于幻想的美人甘娜的爱情。这是一首首爱情的讴歌和生命的礼赞,洋溢着泥土的气息。而湘西世界中的男女之间的爱情多以悲剧结局。情感是深刻的,但缘分是浅薄的,似乎总是逃离不了命运女神的有意捉弄。沈从文的湘西小说系列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民间传说和佛经故事铺衍成篇,从没有现代文明之前的历史中寻觅生命的遗存,如《神巫之爱》《月下小景》《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边城》等作品。《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和豹子是真心相爱的,但仅仅是因为寻找那只辟邪的白羊而发生误会,致使两人先后拔刀自尽,他们爱得悲苦而悲壮。《边城》中的翠翠和傩送也是相爱的,但鬼使神差,错过了很多机会,相爱的人不能终成眷属。美好的爱情似乎总是与死亡相随相依,作者借男女主人公的真挚的爱恋与死亡宣扬一种“神性”的哲学。另一类展示乡民的道德风貌与人生形式与过去世界紧密相连,俨然出乎原始的文化背景,他们热情,勇敢,忠诚,正直,善良,德行品性纯洁高尚,合乎自然,但与此相伴随的愚昧,又使他们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冲击,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从而导致人生的悲剧。这种悲剧不但表现在他们对有悖于人性的雇佣制、童养媳和卖淫制等丑陋社会现象的顺应,更表现在他们对自己现实状态的无知及对自己命运的无从把握,如《萧萧》《柏子》《贵生》《丈夫》。他们的人生命运无法摆脱环境的制约。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破产,乡民精神溃烂,这种溃烂不仅是作为外部环境客体的腐败,而且乡民的精神内部也出现了变异。《丈夫》就描写了人变为金钱的奴隶,人的两性关系是如何成为金钱交易的等价商品的现实,透过下层人尊严的丧失,人性沦落的可怕图景,作者揭露了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违背人性的罪恶。此种生命形式,保留着原始生命的热情纯朴与真挚,而封建宗法关系又限制着他们的自由,乡下人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信天守命思想又遮蔽着他们的理智。沈从文通过这种复杂人生形式的叙写,意在唤醒浮沉在人生浪涛中湘西儿女的灵魂,摆脱人身的限制,争取生命自由,自主与自为。

果戈理创作《狄康卡近郊夜话》时是兴奋而轻松的,在家书中他经常写道:“现在我还要请求您收集一些这类的材料,比如您在什么地方听到我们村

农民中间发生的令人可笑的奇闻轶事,或者别的地方的,或者地主们发生的也行。多费心吧,同样给我写上些风尚习俗和迷信传说。”^{[1] 50}这些是他在城市中展示才华的源泉。《狄康卡近郊夜话》中的氛围是令人窒息的彼得堡所没有的,徜徉在这些自由的空气和热恋的爱情中可以让果戈理暂时逃离空荡荡的城市、死气沉沉的大街和让人窒息的高墙。狄康卡泥土的气息、野草的芬芳和醇香的美酒,为何不乐于此?当然果戈理最终的理想不是离开城市永久地过乡村生活,他要永久地征服城市人的阅读期待,时间证明他成功了。在《狄康卡近郊夜话》第一部取得成功后,更激起了他的创作激情,因而定居城市的信心也越来越足。对他来说,现状虽不太让人满意但却是充满希望的,这就足矣!

沈从文一生都自命为“乡下人”,地域和民族意识埋藏得更深,对他创造的影响也更久远。写作时,他不只是想重温儿时的记忆,更重要的是心理上背负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其作品的基调是悲沉的,主人公的命运无不蒙上一层悲剧的色彩。

三

城市对陌生人,尤其是“边缘人”和“乡下人”,最初的态度是冷漠的,排斥的。在有了类似的城市经历后,在城市印象和体验上,果戈理和沈从文有着强烈的心理共鸣。在漫长的争取城市居住权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原来所向往和憧憬的城市和现实世界完全不一样,“整个城市都干巴巴的,人行道枯燥无味,它的天空几乎永远是灰色的。”^[4]这是果戈理对彼得堡的真实感受。沈从文对其所居住过的北京和上海等城市以及生活其中的城市人也没有什么好感。他们对城市有着太多的不认同,但又有难以割舍的情怀,所以一方面他们是故土精神家园的坚韧守护者,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城市生活的观察者和描绘者。

最让果戈理刻骨铭心的是城市人的生活状态,最让他关心的是城市小人物人性的发展变化及其最终的归宿。《彼得堡故事集及其他》中大部分作品都是以首都彼得堡为背景,讲述着低等官员和小职员这些小人物的悲剧人生。彼得堡就像一个被人类所宠惯的巨兽不断地吞噬着人性,扭曲着人格。《外套》中,基亚每天的生活是完全模式化的:家——办公室——家。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因为房子是

租的,家具非常少,更重要的是缺少家庭的温暖。可以说就是基亚晚上睡觉的避风港,别无他用。办公室的工作除了抄写还是抄写,似乎抄写是为了活着,活着就是为了抄写。由于生活中缺少太多,亲情、友情和爱情,任何与情感相关的纽带都已截断,他就像一台机器一样每天重复相同的工作。《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以精神的疯癫对抗现实的无聊和压抑:想象阅读狗的信件,并且发现狗都看不起他。多么悲哀!由于生活组织本身的缺陷和失调,某种东西出现严重错误,这些人的行为为心理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偏执。基亚把一件外套当成了生命的全部,狂人整天幻想与上司的女儿谈爱,理发匠伊万·雅科夫列维奇疯疯癫癫地找丢失的鼻子。正如鲁迅对阿Q“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果戈理对他笔下的小人物也怀有深刻的怜悯之心。

如果说果戈理关注的是城市中底层人物的命运,那么沈从文把关注的目光朝向了城市的上层人物:高层官员、大学生、学者教授和绅士太太。他总是使用嘲弄的语气,集中笔墨描写他们的日常生活,体现都市人生中生命与生活的对立。如《绅士的太太》中那位犯疯癲的老绅士,生命早就被体面和教养所吞噬,情感被权势所萎缩,理性被财富压迫扭曲。还有从医学的角度看,皆好像有点病的甲、乙、丙、丁教授们,他们一面对爱情情欲嗤之以鼻,一面躲在蚊帐里欣赏半裸体的美女画像,眼睛始终“盯住那上面肉体的凹凸部分”,都表现为“阉割似的阴性人格”。身居城市,享受城市文明的沈从文无时无刻对城市抱有强烈的不满:高大的混泥土森林、拥挤的公车、喧嚷的街道、世俗的市民……所有的一切在这

个“乡下人”眼里都是非人性的,反道德的。都市体验让他感觉到了现代化文明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城市进军,它吞噬了许多传统的文化因子,同时也逐渐形成所谓“现代文明”的新质。即使后来完全被北京所接纳,他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他那根深蒂固的陌生感。在都市中,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强烈地感受到异质文化的撞击,虽然他也做出了相应的抵抗。于是在喧嚣的夜市里,在五彩的霓虹灯下又多了一个精神的流浪者,一个沉迷于“乡村记忆”的营构者。

站在湘西和乌克兰的立场,沈从文和果戈理采用了同一种文化批判策略,对乡村牧歌充满无限的眷恋,对都市现实表现出无尽的鄙视。这种文化批判的态度越强烈,这种边缘身份越坚定,越促使他们美化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惬意的乡村,也使他们更加沉迷于自己构筑的精神家园。人在城,心在乡,在城市与乡村的两难选择中,果戈理和沈从文都难免徘徊于抵抗与眷恋、批判与回想的双重矛盾之中。

参考文献:

- [1] 果戈理书信集[M]. 李毓榛,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 [2] 沈从文作品精选[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 328.
- [3] 从文小说习作选[M]. 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 1961: 2.
- [4] 果戈理全集:第7卷[M]. 任光宣,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213.

(责任编辑:黄声波)